

文献检索理论与实践丛书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

黄晓斧 编著

彭静中 校订

四川大学出版社



K05

《文献检索理论与实践》丛书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

黄 晓 斧 编著
彭 静 中 校订



四川大学出版社

一九八八年·成都

0003072

封面题字：缪 钺

责任编辑：陈克坚

封面设计：蒋仲文

2242/17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

黄晓斧 编著

彭静中 校订

※

※

※

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成都市四川大学内)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煤田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 12.62 字数 263 千

1988年4月第一版 1988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册

ISBN 7—5614—0086—1/G·8 定价：1.82元

《文献检索理论与实践》丛书

主 编 杨以凡

副主编 刘元奎

新史料与新学问

——序《新史料检索与利用》

彭静中

六十年前，王国维说过：“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现”^①，正是如此。由于新的发现，而产生了新的学问和新的学科。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的经古文家之学，赵宋古器物出，而有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汲冢《纪年》出，而有禹、益，伊尹之新学说。因此，王国维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②。又指出，中国学问上最大发现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之殷虚甲骨文、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处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写本书卷、内阁大库之元明以来书籍档册。此四者之一，已足当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发现之金石书籍、于学术有大关系者，尚不与焉。故今日之时代，可谓之发现时代，自来未有能比者也”^③。

王氏之言甚是，时过周甲，仍有其新的历史意义和科学价值。

新史料，新学问的出现，学术文化界必须迎接新的挑战和新潮流。要理解和掌握新史料，投入新的潮流，必须具

有博大的胸怀和远见的卓识。陈寅恪曾经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预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④。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一些新史料、新学问、新思潮，如何才得“预流”而赶上时代学术之浪潮呢？这是我们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我治学之士，慎毋闭门以造车！

在当代，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要面向四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时代精神昭示下，要造就大批四化建设人才，我们必须培养大学生们的自学与独立研究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要了解学科信息，掌握知识情报意识，具有获取文献材料的技能，从而吸取新信息，新知识，改善知识结构，懂得如何去整理、选择、鉴别、利用文献资料，发挥积极性，创造性，为加速两个文明建设，贡献我们的一切力量，这是人民的要求，时代的使命。

要完成这些使命，大学生们必须懂得各种文献资料的检索和使用，花较少的时间，获得较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使用现在的口语来说：时间就是金钱！质量就是效益。文献的检索和使用，就是为提高大学生们的治学能力而设。是教育改革的前进鼓吹！

文献检索和使用，必须依靠学校图书馆，图书馆就是学校的教学基地和协调中心。馆中收藏的各种目录，引得，工具书，参考书，就是赖以治学的工具，我们必须学会使用它，因此，以图书馆为中心来组织教学，是责无旁贷的。我

校图书馆正组织编写各种文献检索与利用的教材。开展文献咨询服务和各项文献检索的设施，这对于我们的数学，科研，教育改革，都将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二

为推动学校教学、科研的发展，加速培养人才和出成果起见，四川大学图书馆，青年图书馆学工作者黄晓斧同志，在公余之暇，勤奋学习，刻苦钻研，经过长期的深入究研与思考，饶有心得。在校馆领导、师友和同志们的支持鼓励之下，本着贯彻教委指示和为教学服务的原则，写成了《新史料检索与利用》这本科学著述，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们必备的工具书，参考书，更是高等院校学生们必读的教材。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这本书中所说的新史料，是广义上的史料，乃指上一个世纪来到目前为止的考古发掘的地下文物资料和新发现的古代文献材料。这里特限于商、周甲骨、商周金文、战国及汉晋简牍、敦煌文献和明清档案等五种不同时代、不同载体的文献材料。在最近九十年来，这五种新史料的研究，已发展成独立学科，成了新的学问。这些学问，不仅在国内成了热门，而且在国际上，也成了广大汉学界研究的热门。从学科研究的实绩来看，是后来居上，国人创获最多，这是由于国内的学者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取得的。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这本书，她包含了当代文献研究的五个专门课题，并将不同时地，不同文字的大量论

文，著作资料，详细占有，深入介绍。大家知道，这些论著资料，散无友纪，寻检不易，或大海捞针，事已倍而功不及半，真“头白可期，杀青无日”。今晓斧此著，正是为广大研究者，提供器具，缩小人与资料的差距，以较少的时间，就能把握这门学科的历史与现状，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很快了然于心。俾新文献，新史料在新的时代，为人民程功效力，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发挥效益，为振兴中华而作出历史性的贡献！

《新史料检索与利用》这本书，从其内容而言，又可以说是中国甲骨学，金文学、简牍学、敦煌学，明清档案学的一本简明扼要的学术史，史学史。同时，她包含了较多的文献解说的内容，不是简单的索检，通过解说和介绍，将海内外对于这些学科研究的芳踪雅迹、成就得失，予以客观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有利于海峡两岸的炎黄子孙的学术交流合作，国际汉学界的团结与互助，这是具有时代精神的事业。大家知道，因五种新史料的发现而出现的五门新兴学科，有的起步较晚，有的正在深入，发展是不平衡的。从这五门学科内容而言，研究上可资借鉴的资料不多，要充分释读和掌握这些内容，须具有较高深的历史文化素养，从某种意义上看，每门学科，都可以说是一个知识密集而尖端的系统工程。就研究队伍和阵容而言，似又是一门老年学科。当然，随着材料的公布，方法的改进，理论水平的提高，队伍的扩大，研究的深入，专业工具书，参考书的出版以及普及性读物的问世，这门科学必须随着科学文化的春天的来临而日益普及化和年轻化，发展结果必将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⑤”，这是可以断言的。在党的开放、改革方针

下，上述五门学科，将由专家学者的深邃堂奥，走入时代的骄子的心房，从而焕发出美妙的青春。这是历史前进的必然性。就以本书而言，人们通过阅读讲授，会增进自己对文献的检索与利用的技巧，功能和方法。所以，这门学科的普及、深入、提高、发展、又是大有希望的。科学有险阻，愿得攀登莫畏高！胜利从古属英豪！

三

为了更好地深入理解和掌握本书的内容，下面就五个方面的问题，谈一些自己的看法。

（一） 关于商周甲骨文研究的问题

殷虚（俗作墟、非）甲骨文，从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被发现以来，第一部甲骨著录《铁云藏龟》的出版，到1979年（即甲骨文发现的80周年）著录片数最多，包罗最广，印制最精的《甲骨文合集》的问世，重要资料的汇集和出版，大体具备。无论断代研究，分类著录，残片缀合等方面，都有新进展、新成就。

《甲骨文合集》的出版，既体现了我国甲骨学研究的新水平，又强有力地说明了党和政府对于文化事业的珍视，以及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

甲骨之学，重在考史，不惟文字。然字有不识，义则难解，而甲骨内容的研究，则无从说起！学甲骨者有如牛毛，而获成就者则如麟角，原因多在不识文字之故。一些锲而不舍的学者，经过长期艰苦细致的究研，由识其字而通读其

内容，取得了既深且广的卓越成就。

1964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将1934年，由孙海波所编的《甲骨文编》一书，进行了增补改定，依《说文》模式，其正编始一终亥，收录了1,723字，附录收录了2,949字，共计4,672字。甲骨刻辞中所见已识未识的字，大体已收齐备。

195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树达（1855~1956）先生的《积微居甲文说》、《卜辞琐记》一书，收考释文章50篇和49条，识字考史，后来居上。

1979年，中华书局出版的于省吾（1896~1984）先生的《甲骨文字释林》一书，收录文章190篇，释字头近三百个，是释难字最多的学者。

其余考释文字方面的短篇文章，时有精彩之论，这里就不多及了，因本书已有详细论列。

九十年来，海内外学者的甲骨论著，将近千种，一人的时间、精力、素养，势难遍观，更何况解放前，甲骨被视为古董，印数既少，其价亦昂，所以，甲骨学不仅是老年学问，而且是富家之物，一些学阀又予垄断，使一般的人难于接触，这严重影响了甲骨学这门学科的发展和普及提高，这是甲骨文的不幸！

解放后，改变了过去的情况，书籍的出版，新材料的公布，大学开设甲骨学，科研机构设有甲骨研究室，这有力的促进了甲骨学的发展。

近九十年来，甲骨学本身的研究发展，可从不同的角度划分为若干阶段。但从客观上讲，科学的甲骨学，似可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从1899年，甲骨被发现，到1903年，第一

部甲骨著录之书《铁云藏龟》的问世，至1929年，郭沫若著《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是为第一期。这时是甲骨文的非科学发掘阶段。也是甲骨研究的早期阶段。由旧的研究方法，到新的研究开始。也就是由地主资产阶级的甲骨学到马列主义甲骨学的过渡时期。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是中国甲骨学奠定基础的时期。初步由识字而及于卜法、贞人、世系、礼制，考史等等。

1929年至1978年，为第二个大时期，也是马列主义甲骨学时期。前中央研究院，对殷虚进行了发掘。郭沫若先生避地日本，除在1929年9月20日，写了《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一文之外。在1929年8月1日，《甲骨文字研究》一书，全书录成，作了《序》及《序录》。1931年5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问世。郭先生以马列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甲骨，对他之前的甲骨研究状况，作了实事求是的总结。

郭先生说：“中国学者，特别是研究古文字一流的人物，素少科学的教养，所以对此绝好的史料，只是零碎地发挥出好事家的趣味，而不能有系统的科学的把握。罗（振玉）王（国维）二氏其杰出者，然如‘山川效灵’、‘天启其衷’的神话，时不免流露于其笔端。在这种封建观念之下所整理出来的成品，自然是很难使我们满足的⑥

这是郭先生对甲骨第一大阶段的总结。罗王的成就，郭先生不止一次的予以肯定，同时指出他们的不足，这是非常必要的。在批判旧时代中找出前进的道路。没有批评，学术就很难发展。

郭先生说：“我们现在也一样地来研究甲骨，一样地来研究卜辞，但我们的目标却稍稍有点区别。我们要从古物中去

观察古代的真实情形，以破除后人的虚伪的粉饰——阶级的粉饰。本篇（《卜辞中的古代社会》）之述作，其主意即在于此。得见甲骨文字以后，古代社会之真实情况灿然如在目前。得见甲骨文字以后，《诗》、《书》、《易》中的各种社会机构和意识才得到了它们的泉源，其为后人所粉饰或伪托者，都如拨云雾而见青天。我认定古物学的研究在我們也是必要的一种课程，所以我现在即就诸家所已拓印之卜辞，以新兴科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社会的古代”^⑦。

从郭先生的《卜辞中的古代社会》和后来的《甲骨文字研究》等开始了甲骨学的第二大时期，郭先生是中国甲骨学的划时代的代表人物，他开辟了马列主义的甲骨学时代。郭老于1933年和1937年，在日本分别出版了《卜辞通纂》和《殷契粹编》及《考释》等大著，她“帮助了学者自浅而深的全面的有系统的了解卜辞内容，并进而得到殷代社会各方面的结论”^⑧。

中国社会经历了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蒋家王朝的复灭，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到郭老生前主编《甲骨文合集》，1978年6月郭老逝世为止，这是中国甲骨学在马列主义指导下大发展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里，甲骨文研究方面，董作宾的断代，唐兰、于省吾的释字，容庚、商承祚等出版了专集，胡厚宣先生出版《甲骨学商史论丛》一、二、三集，并著录了多种甲骨片子的专集。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陈梦家出版了《殷虚卜辞综述》一书，该书是一部全面性的综合论述，宏观与微观并

举，资料丰富，内容全面，虽有不足之处，但对于初学和研究，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参考书。

第二个大时期，包括新的两个大的历史段落，在郭先生的启示下，促使甲骨学深入发展，是以甲骨文来科学的研究商代历史文化的新时期。

第三个时期，是自郭沫若先生逝世起，到《甲骨文合集》的出版，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合集，随着学术界理论水平的提高，方法的改进，电子技术的应用，其他社会科学之发展，甲骨学将随《甲骨文合集》释文的出版，考释的公布，使甲骨学进入一个更为发展进步的历史新时期。

至于解放以来甲骨文研究状况的综合介绍，则有王宇信同志的《建国以来甲骨文研究》一书，介绍了解放后甲骨文研究的详细情况，也是一本带资料性质的参考书。

甲骨文发现80周年之际，装锡圭同志发表了《殷虚甲骨文研究概说》一文，对80年来甲骨文发展情况，扼要论述，是以少许文字胜长篇大论的好文章，入门者自当一读为是。

台湾省的李孝定出版了《甲骨文字集释》一书，反映了台湾省学所研究的情况，李氏本人有一定研究，从资料上说，是可以一看的。

日本国学者岛邦男出版了《殷虚卜辞综类》一书，是一本按字头查各有关条目的类书，方便查检。

今日说到甲骨文，就意味着包括殷虚以外的周人甲骨文，在1987年7至8月，在陕西岐山周原发现周人甲骨文，共17,000多片，除卜骨三百多片外，均为卜甲，有字卜骨有90多片，580多字，这扩大了甲骨文的时代与地域。

殷周甲骨，不是我国最早的甲骨，他还有老资格的先导。近年在河南舞阳贾湖新石器遗址出土的甲骨所显示的契刻符号，早于安阳虚殷的甲骨卜辞4000多年^⑨ 这给学术界提出了一新的研究课题。乃发现新史料而来的尖端问题。

（二）关于商周金文研究的问题

我国青铜器的研究，有上千年的历史，再往上，则西汉宣帝刘询（前73至前49年在位）时，即有美阳得鼎，张敞释读之事^⑩。但早期是作为金石学的一个分支，款识题跋，作为珍宝古董的多，用以考史论古者少。

爰及北宋，刘敞为永兴守，将其所得器物，编成《先秦古器记》，开始了赵宋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大要在明制度、正文字、次世谥。随之而有吕大临《考古图》，王黼《宣和博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等等。

宋人尚理学，文字训诂，虽非所长，然其摹写形制，考定名物，说解文字上，仍有可供后人参考者。

从旧的金石学的发展来看，两宋以后，元明是一个中衰时期。清朝因文字狱特甚，人们埋头于古文献（主要是儒家经书）和古器物、古文字之研究。其间钱坫、阮元、吴式芬、吴云、吴大澂、方浚益等在收集青铜器铭文，著录成书上，都作过有益的贡献，虽然他们仍是旧金石学的支流套路，但为后来金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从清未到民国初年，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等，在前人研究基础上，有个别的创获，他们在资料的收集编印流布方面，作了有益的工作。

从历史来看，罗振玉、王国维等人，特别王国维，在研

究青铜器铭文方面，虽然取得了某些成就，但无科学系统的知识，只是旧金石学一个最高表识而已。

然则马列主义的科学的金文学从何时起？谁为代表？今后又将怎样发展？

从旧金石学到马列主义金文学的建立，求之当代，如同甲骨文研究一样，不能不以马克思主义者的郭沫若先生为代表，他是科学金文学的划时代人物。

1929年11月7日，避地日本的郭沫若先生，写了《周代彝铭中的社会史观》一文，为要阐明中国古代社会，要研究各种史料，因此他说：“然在目前有一件不可缺少的事情便是历代已出土的殷、周彝铭的研究”^⑪。

历代出土器物二三千具以上，没有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但此等古器历来只委之骨董家的托摩嗜玩，其杰出者亦仅拘拘于文字结构之考释汇集而已”^⑫

传世铜器甚多，学者不会也不善于使用它，时代不分，国别不明，没有条理，包括王国维等在这方面也无能为力。

郭沫若先生说：“故历来谈史地之学者每置古器物古文字之学于不顾，甚或加以鄙夷，而谈古器物古文字之学者，于史地之学亦复少所贡献，王国维所谓“于创通条例，开拓闾奥，概乎其未闻”者（见《殷虚书契考释序》），殆谓是也。顾条例之当如何创通，闾奥之当如何开拓，卓荦如王氏，则亦秘而未宣。间尝观其所曾为，多文字考释，器物鉴别之零什，虽饶精当，而与古法无多殊。其两《金文著录表》仅就已成之书而为之作通目，亦未足以当此。王氏始有志而未竟者邪”^⑬。

郭先生之论甚是。这里既总结了王国维在内的旧金石学

的成绩，也指出其严重的不足。

郭先生在批评旧金石学中，指出了金文学研究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1931年，郭先生出版了《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同年又编写成《两周金文辞大系》一书，将传世铜器分为宗周器和列国器。西周从武王至幽王进行分期研究，得162器。东周列国得161器，得国32。判明时代，究出国别，方便使用，构成体系，这是空前的创举！

1932年，郭先生又作《金文丛考》一书，汇集一些单篇文章，重在考释文字。这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相辅而行的姊妹篇，方便参考，示学者以门径，至今仍是一部入门和升堂的工具书！

郭先生从登上金文阵地，一直战斗到他撒手人寰为止，他是我国领导当代金文学研究潮流的代表人物。在金文领域内，容庚、于省吾，唐兰、杨树达、陈梦家，黄盛璋等人，著书立说，对于金文学的发展，都起了推动作用。

研究金文，目的在考史，但识字是基础，上述诸家都对金文作过有益的解释。当代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出土的上万件的器物，随着材料的公布，促进了金文研究的发展。从文字上看，远的不说了，近20年来，金文新识文字的大量增加，表明了新中国的金文学新水平。从《金文编》看，1959年，《金文编》第三版印行时，所识文字是1,894名，不认识的附录文字为1,200名。

解放后，杨树达先于1951年出版之《积微居金文说》一书，识字多而意通达，纠正旧说不少。于省吾云：“（《积微居金文说》）新识创解，胜义纷陈，自孙籀廌、王观堂以

后，一人而已。其他皆自郅以下，何足数也”（《积微翁回忆录》354页）。说的正确。解放后新出之金文研究著作，此书为第一。而1959年出的增订本，尤臻完善，某种程度上说，本书代表我国金文学水平。郭老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积微居金文说》成功的基础。

到1984年6月，《金文编》（摹补本，实为第四版。1985年，中华书局出版），其正编所识文字为2,420名，附录的1,352名。第三版与第四版相较，新识文字增加了526名，而附录文字只增加了152名。新识文字的大量增加，附录文字的大量减少，正表明了我国金文学研究水平的大大提高。香港中文大学的《金文诂林》和《附录》乃用力多而收获少。

我国台湾省、香港地区的学者们，也对金文进行了研究，总的是用力多而成效少。为什么？首先是他们没有马列主义观点，又不善于学习国内的先进经验，受着客观限制，不利文化合作交流，所以台湾统一回祖国是个迫切的问题。其次，他们受着资料的限制，也无法接触原器物，心有余而力不足。当然，他们汇集流散的青铜器资料，还是值得肯定的。比如严一萍的《金文总集》一书，收有8千个器物，他的识字水平，虽然不敢恭维，但汇集众器，功不可没。

1978年6月，郭老去世，结束了金文研究的郭沫若时代，来者将在郭先生的业绩上前进。

1978年，随着《殷周金文集成》的出版，资料汇集齐全，对于今后金文学的发展，无疑会起到推动作用。

1984年，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殷周金文集录》一书，收解放以来至1980年出土或著录的铜器973件，而“多